



朱迎平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

GUDIAN WENXUE YU WENXIAN LUNJI

千金駿馬換山王，
雅鞍歌落
積名酒未流也，
糟酒滓也，王充論
積惜因爲丘此形容嗜酒思想之

206, 2
/

本书由上海财经大学资助出版

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

GUDIAN WENXUE YU WENXIAN LUNJI

朱迎平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

GUDIAN WENXUE YU WENXIAN LUNJI

朱迎平 著

责任编辑 黄 磊

封面设计 周卫民

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发行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	
印刷	上海浦江装订厂	
装订	850mm×1168mm	1/32
开本	8	
印张	200 千	
字数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版次	1—1000	
印数	ISBN 7-81049-197-0/I·01	
书号	13.50 元	
定价		

序

朱迎平同志于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经听过我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对中国古典文学颇为爱好。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财经大学语文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教课之余,致力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成绩显著,已经出版了《文心雕龙索引》、《管子全译》(与谢浩范同志合作)两书。十多年来,他在各种期刊上陆续发表了二十来篇论文,最近,他把它们加以辑集,连同尚未发表的若干论文合在一起,取名《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浏览之下,我感到十分高兴。

迎平同志论文的一个明显特色,就是注意别人忽视的现象,善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他在本书第一、二辑中关于文体论和文体辨析的几篇文章,就是一例。文体论和文体辨析,本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学人,对此往往不甚重视,研究成果也少。迎平同志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整理积累了大量材料,对其来龙去脉获得系统清晰的认识。收集在本书中的若干篇论文,是他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又如南宋时期,散文创作颇为发达,名家辈出,有的名家如陆游、叶适等成就卓异,可惜过去文学史研究者对此未遑深究。迎平同志阅读了许多南宋名家文集,仔细考察,审慎比较,以充足的材料和论证,阐述了南宋散文的辉煌成绩,这就打破了过去以唐宋八大家中的北宋六家为宋文高峰、后难为继的陈见,为开拓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领域作出了可喜的成绩。除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外,迎平同志还注意中国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如收集在本书第一

辑中的《汉魏六朝文集的演进和流传》、《第一部文人传记〈文士传〉辑考》等文章,都整理、探究了一些为人们忽视的文献,为古代文史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此外,收集在本书中的其他一些短文,也大抵是他平时读书有得的札记、短论,值得读者参考。

迎平同志平时读书细心认真。他不怕枯燥,不怕坐冷板凳,不怕写成的文章短期内无处登载,勤勤恳恳,系统阅读了大量原始材料,客观地加以分析归纳,对不少古代文学和文献现象作出了富有条理的阐述,并提出自己中肯的看法。这种勤奋治学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学风是难能可贵的。他在上海财经大学从事基础汉语教学,在平时相当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抓紧时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的研究,孜孜矻矻,十多年如一日。他能在所耕耘的领域获得如此良好的成绩,自不是偶然的了。

王运熙

一九九七年七月

目 录

序 王运熙

汉魏六朝文集的演进和流传 (1)

六朝文学专科学目辑考 (17)

附录:六朝文学专科学目佚文 (24)

第一部文人传记《文士传》辑考 (30)

附录:《文士传》佚文 (36)

《文章缘起》考辨 (50)

《文心雕龙》的文学界说辨析 (59)

中国古代文体论论略 (72)

《文心雕龙》文体论体系及其影响 (88)

唐代古文家开拓散文体裁的贡献 (97)

唐传奇的体制特征及其渊源 (110)

《灵怪集》不是六朝志怪 (117)

乾、淳宋文中兴论 (119)

论陆游的散文创作 (137)

论叶适的散文创作 (151)

永嘉文派考论 (164)

南宋散文宗欧、宗苏辨 (179)

汉魏六朝的游戏文 (185)

杜甫《偶题》臆说	(191)
中日文化交流的奇葩——《文镜秘府论》	(197)
唐宋律诗的精华荟萃——《瀛奎律髓》	(201)
康海作《中山狼》杂剧斟疑	(206)
再谈《中山狼》杂剧的作者	(212)
《骈体文钞》与“骈散合一”论	(218)
六朝丽辞明旨要	(223)
古籍引书索引的功用和编纂	(228)
古代经济文献整理刍议	(234)
后 记	(243)

汉魏六朝文集的演进和流传

文集是古典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是荟萃古代诗赋、词曲以及各体文章的主要文献体类。在中国古代的四部文献中,集部形成最晚,却后来居上,蔚成大国,成为四部中最庞大的一个部类。以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为例,它共收四部书三千四百六十一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其中,集部为一千二百七十七种,二万九千二百五十四卷,无论种数和卷数都居四部之首。^①历代文集卷帙浩繁,虽然各时代的重要文集有相当部分已经整理或正在整理,也产生了《唐集叙录》和《清人文集别录》等断代文集研究专著,但总的来说,对历代文集的研究仍是古典文学文献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拟对文集的创始期——汉魏六朝文集的演进进行考察,以期理清其发展脉络,并兼及汉魏六朝文集的流传情况和整理研究现状。

文集创始于何时?它的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最早对这些问题进行论述的是《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集部小序: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别集类序)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摅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撷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

抄，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总集类序）

要之，《隋志》首先提出了“别集创自东汉，总集始于挚虞”的观点。其后，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以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等，都继续有所阐发，但这些论述无不本之于《隋志》，且寥寥数语，过于简略。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中立《文集》专篇，对文集的源流得失进行了较详尽的考辨，其论文集的形成云：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间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词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訖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自挚虞创作《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称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

这段论述从古代学术源流入手，勾勒出文集形成的大致轮廓，较《隋志》等所论前进了一大步，洵为卓见，但仍嫌疏略，语焉不详，有些论断也不尽妥当。

参考《隋志》、章氏等的意见，征诸有关文献记载，本文将文集创始阶段的演进过程区分为四个时期。

一、孕育期

诚如章学诚所说，春秋之前，还没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的私家之言；战国诸子勃兴，授徒传家，但也没有专以文章为业的。这些都说明，先秦时代的文学和学术融为一体，文学尚无独立地位。进入西汉，情况就有了改变。首先是辞赋的兴起，赋家可以凭着铺采摘文、逞辞扬厉直接入侍君主，谋取爵禄，这说明文学开始成为一种专业。其次是各体文章的形成，除诗赋外，奏疏、议对、诏策、颂赞、箴铭、书檄等文体也都逐步定型，创作日盛，这说明文学具备了独立的形态。但这时期的文学，还没有完全摆脱依附学术的地位，如贾谊的《新书》（属子部）编入有十余篇奏疏，名篇《过秦论》也编在卷首，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也有类似情况；又如《史记》纪传中全录或节录了不少单篇文章，李斯《谏逐客书》、贾谊《吊屈原赋》等名篇皆赖《史记》载录而得以流传。（这一传统为《汉书》继承发扬，并成为古代正史的通例）这些情况又表明，文学彻底摆脱经、史、子而自立门户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因而西汉前、中期，可称之为文集的孕育期。

二、诞生期

西汉后期，刘向及其子刘歆等，受诏搜求遗籍，校书秘阁，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这就为文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首先是《楚辞》的编定。刘向哀辑屈原、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及自己的骚体作品共十六篇编为一帙，定名为《楚辞》，这实际上标志着第一部文集的诞生。^②《四库提要》称《楚辞》为“总集之祖”，是颇有见地的，因为它确是汇编诸家作品而

成的一部总集。按照刘向校书的通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虽然《楚辞叙录》没有流传下来，但刘向在编纂过程中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当是没有疑义的。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依据的就是刘向的编定本。由于《楚辞》在文集上的开创地位，《隋志》将它及有关研究论著列于集部之首，而与别集、总集等并列，后世目录都沿袭其例，遂使它与总集脱离。章氏论文集不及《楚辞》，恐怕也是将它作为例外对待的。《楚辞》在集部应入总集或是自成一类，这个问题还可讨论，但它作为第一部文集诞生的标志，却是没有疑义的。

其次是诗赋类的建立和诗赋作品的整理。刘向校书完成后，“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七录序》）《别录》、《七略》虽已亡佚，但《七略》的分类体系和主要内容，都被班固采入《汉书·艺文志》得以保存至今。《七略》共分图书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大类，再加上作为诸书总要的辑略，共称“七略”，可见此时诗赋文学作品已取得了与六艺、诸子等相并列的地位，并在图书分类和学术体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诗赋类的建立标志着文学独立地位的确立。《诗赋略》共著录屈赋之属、陆赋之属、荀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类一百零六家的作品一千三百十八篇，可以想见当时诗赋创作之盛以及刘向父子曾对文学作品作了怎样大规模的整理。虽然诗赋以外的文章当时尚未汇聚，而且诗赋作品也只称篇目而不称文集，但这一家家分类搜集的作品，正是后世别集的雏形。

东汉以后，各种文章体裁日益丰富，各体文学作品也日趋繁盛，《后汉书》列传末多著录有传主的作品即是明证。如《傅毅传》：“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蔡邕传》：“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勤学》、《释海》、《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类似著录有四五十家之多。虽然《后汉书》为刘宋时范曄所著，但其主

要的史料依据《东观汉记》则是班固等东汉学者撰成的国史，可见著录传主文章当是东汉时为文人立传的通例。它一方面反映了文人和文学作品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汇聚作者的各体文学作品已相当普遍。但这时文集的名称尚未被采用，这不但从史传的著录中可见，而且释“集”为“文集”的义项在当时的辞书中也没有出现。产生于东汉的许慎《说文解字》中“集”字仍依本义释为“群鸟在木上”，而不涉文集意；刘熙的《释名》则未收“集”字。因此，对文集的演进来说，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诚如章学诚所言，是所谓“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

建安时期，以“三曹七子”为代表，形成了文学创作的高潮，文集的编纂也正式见诸文献。曹丕《与吴质书》云：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以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文选》卷四二）

所谓“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明确指出曹丕曾汇编诸子文章，合为一部总集；这里还明白地出现了“集”即“文集”的概念，也是值得注意的。又曹丕《与王朗书》云：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这里的“论撰”亦指汇编或编纂之意，则曹丕又曾编过自己的文集。曹植也编有自己的文集，并留下了一篇《文章序》称：

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艺文类聚》卷五五）

可见这部题为《前录》的文集是赋集，包括经曹植亲手删定的七十八篇作品。曹植死后，魏明帝于景初中下诏“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三国志》本传）则曹植还撰有汇聚各体文章的《后录》，故称“前后所著”。又据曹植庶子《曹志传》载：“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案。’还奏曰：‘案录无此。’”（《晋书·曹志传》）则曹植还曾为自己的文集亲手编过目录，珍藏传世。从曹氏兄弟分别为他人和自己编纂文集，并撰写序言、编作目录的记载来看，建安时期确已诞生了有实有名、名副其实的文集，包括总集和别集。

三、成长期

魏晋以降，“群文滋长，倍于往者”（葛洪《抱朴子自序》），新生的文献体类文集的编纂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兹将《隋志》别集类著录的汉魏六朝文集（包括梁代著录而隋时已亡的所谓“梁有”的文集），分朝代统计如下表：

朝代名称	西汉	东汉	三国	西晋	东晋	宋	齐	梁	北魏	北齐	北周	陈	隋	总计
立朝年代(年)	230	195	60	36	102	60	21	55	150	27	23	32	37	824
别集数量(部)	30	65	70	125	251	168	56	98	8	3	8	26	18	928
年平均数(部)	/	0.33	1.17	3.47	2.46	2.8	2.67	1.78	/	/	/	0.8	0.49	/

虽然这时期的别集因“年代迁徙，亦颇遗散”，但“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隋志》别集类序），故这一统计还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从统计中可知，从曹魏至刘宋，是别集数量飞速增长的时期，而尤以晋、宋二百年间为盛，其年平均数都大大超过了唐代，^③表现出新生的文集的强大生命力。此外，《隋志》著录的近二百五十部总集，也都是在曹魏以后编纂的，相当部分是晋、宋两朝的产物。因

此，这一时期确是文集的迅速成长期。

除了数量上急速增长之外，成长期文集的另一个特点是基本趋于定型。一是别集名称的固定。《四库提要》集部总序云：“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至于六朝，始自编次。”因而两汉的文集，都是由后人追录题名的。曹植自编的文集题为《前录》而未称“集”。今见最早用姓氏标明为集的是《诸葛亮集》。《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受诏“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晋书·陈寿传》），并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之末附列《诸葛氏集》目录和书成奏上时的表章，其中称“删除重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虽然此集的内容还有子书的痕迹，但已包括多种体裁的文章，并明确标名为“某某人集”，则最为通行的文集命名规则已经形成。二是总集体例的完备。前述曹丕所编总集的体例已难考知，但其后就不断有总集问世，据《三国志·陈群传》注引《魏书》：“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则曹魏时曾编有奏议体总集；西晋傅玄撰有七体总集《七林》，“集古今七而论品之”（《艺文类聚》卷五七，引《文章流别论》）；《隋志》总集类著录的西晋总集还有荀勖《晋歌诗》十八卷、《晋燕乐歌辞》十卷，杜预《善文》五十卷等多种。可见较早产生的总集多为汇聚一体的总集。至曾任秘书监整理典籍的挚虞（？—公元311年），“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晋书·挚虞传》）《文章流别集》是第一部汇编众体的文学总集，它网罗诸体，规模庞大，对后世总集的编纂影响极为深远，《隋志》又将它列为总集之首，因此历来备受重视。但将《文章流别集》称为第一部总集是不妥的，因为此前汇聚一体的总集已有多种。此后，汇聚一体和汇编众体就成为总集的两种基本体例。

随着文集的迅速发展，综录诸家的文学专科目录也应运而生。前述曹植曾亲手编作自己文集的目录，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推测，“当时撰著繁富者，皆各自为目录”，《隋志》著录的别集也

常附叙录一卷。最早的文学专科目录就是汇聚诸家文集的叙录而成,这就是荀勖的《文章叙录》。荀勖(?—公元289年)是西晋目录学家,曾“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晋书·荀勖传》)。其《文章叙录》在《隋志》簿录类中著录为《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所谓“杂撰”当指各体文章,“集叙”即汇聚诸家文集叙录。根据今辑录佚文推测,该书的收录范围大约为曹魏至晋初间作家的别集,全书十卷的规模也相当可观。这批文集的编纂可能都经过荀勖之手,可以说,荀勖是第一个大力从事文集整理的学者,他高度重视这种新兴的文献体类,并继承刘向的校书传统,对其作了认真的整理,还撰成了第一部文集目录,荀勖对文集的发展功不可没。稍后于荀勖的挚虞在编纂《文章流别集》的同时,又“撰《文章志》四卷”(《晋书》本传),这是一种传录体的文学专科目录,用传略的形式著录作者的创作情况。据《文章志》佚文推测,它收录作者的范围主要是东汉和曹魏时期,因此挚虞对汉、魏别集的整理也当是有功之臣。^④其后,这种叙录体或传录体的文学专科目录形成为连续的系列,主要还有:傅亮《续文章志》,著录西晋文学;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著录东晋文学;丘渊之《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著录晋末宋初文集;沈约《宋世文章志》,著录宋代文学。^⑤从汉魏至刘宋的这批连续的文学专科目录,正是成长期文集发展的最好记录。

文集的繁盛带来了文学地位的进一步提高。继刘歆在《七略》中将诗赋独立一略后,西晋荀勖在整理记籍的基础上“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隋志》总序),其中甲、乙、丙三部分分别著录六艺、诸子、史记,丁部则包括诗赋、图赞、汲冢书三类,这就在四分法的目录体系内确立了文学的地位。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文选》注引臧荣绪《晋书》),较之《中经新簿》,它调换了诸子与史记的位置,纯化了丁部的内容,从此,文学在四部书目中的位置就固定下来。与此同时,文学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又逐步取得了官学

的地位。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立儒、玄、史、文四学,由谢元主持文学;至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又立总明观,设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四科学士各十人。至此,文学已在学术体系和官方学府中都占据了稳固的地位,而这与文集的成批涌现正是密切相关的。

四、成熟期

齐梁时期,文集的演进进入了成熟阶段。首先是数量的稳定发展。从前列统计表中可以看出,齐、梁二朝别集在前代迅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而这时期各类总集的编纂数量较前代更多,如梁昭明太子萧统就撰有《文选》三十卷、《文章英华》三十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等多种总集(均见《隋志》著录)。其次是类型的丰富多样。《四库提要》别集类序云:“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⑥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⑦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这里列举的自制名之集、区分时间之集、区分文体之集、区分官任之集、专录逸文之集、全集、自选集等别集类型,充分反映了文集成熟期体式的新发展,也为唐以后各类别集的编纂开拓了道路。再次是文集定著的确立。至刘宋为止的历代书目,都沿用《七略》的旧例,将文学类目称作“诗赋”,但大量产生的各体文章,显然已难以包容在这一名目之下。南齐王俭改革四部体制,依《七略》撰成《七志》,改《诗赋略》为《文翰志》,扩大了这一部类的包容量。至梁代,阮孝绪进一步撰成《七录》,其《七录序》称:“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遂将《文翰志》再改为《文集录》,终于使各体文学作品以“文

集”的名称定著于书目之中。以后《隋志》沿用“文集”作为部类名称,并成为后代书目分类的定则。这一定著的完成,宣告了文集这一文献体类的最终成熟。《七录·文集》录内分四部:楚辞部著录五种,别集部著录七百六十八种,总集部(估计专指汇编众体的总集)著录十六种,杂文部著录二百七十三种,四部凡一千零四十二种,一万零七百五十五卷。文集录虽已亡佚,但它的内容基本都保存于《隋志》文集类之中,它以目录的形式,检阅了汉魏至齐梁的文集演进过程和繁盛情况,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至于陈、隋及北朝的文集,则可视为齐梁文集发展的余波。

综上所述,从西汉至齐梁,文集的演进历经孕育、诞生、成长和成熟四个阶段,终于发展成为古典文献的一大部类。虽然汉魏六朝在文集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仅是创始阶段,然而,它以一千余部文集的煌煌业绩,掀开了文集发展史璀灿的第一页。

纵观汉魏六朝文集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它与中国文学从脱离学术而独立、继而进入自觉时代、再到成熟繁盛的发展历程是同步的;或者说,中国文学的成长,是同其载体文集的成长紧密相连的,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

文集的诞生是各体文学创作繁荣的必然结果。早先文人的作品多有流散各处的情况,如“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四库提要》集部总序),即是其例。刘向校书,汇聚了大量作品;史家立传,也广泛搜集了篇目。但这些都主要是为了著录,而非流通,它们采用的都是作品的原始计量单位——篇。随着创作的日趋繁盛,迫切需要一种包容更广的作品计量单位,于是,“文集”的概念和名称便在曹魏时应运而生了,它兼具著录和流通两种职能,很快就成为这类文献的基本单位。因此,文集的形成完全是文学发展瓜熟蒂落的产物。而这种新的文献体类一旦产生,又对文学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文集汇聚作品形式多样,或一人一体(如曹植《前录》),或一人众体(如大部分别集),或